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30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史略	王昆仑 王炳南 屈武(1)
------------------	-----------------

附件一 周恩来对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央同人的谈话	(11)
----------------------------------	--------

附件二 周恩来对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北平诸同志的 谈话.....	(16)
------------------------------------	--------

附件三 周恩来关于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 的解释报告摘录.....	(19)
---	--------

附件四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结束声明.....	(21)
-----------------------	--------

附件五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盟员名单.....	(23)
-----------------------	--------

日记片断(1948年12月29日至1949年6月28日)	
------------------------------	--

.....	包尔汉(25)
-------	-----------

英伦杂感	费孝通(42)
------------	-----------

回忆旅居日本三十二年	吴伯康(49)
------------------	-----------

回忆越南华侨的爱国救亡运动	徐安如(63)
---------------------	-----------

南非华侨情况忆述	叶 迅(71)
----------------	-----------

严修与学制改革	王芸生(85)
---------------	-----------

关于王芸生先生所撰《严修与学制改革》

一文写给吴觉农先生的一封信（节录）

.....	严仁赓(107)
老教育家李湘宸先生事略	杨毓节(111)
国民党政府统治教育事业概述	高思庭(119)
上海泰东图书局与新文学运动	谷馨山 赵树芬(138)
“神州国光社”后半部史略	陈铭枢(144)
回忆孙寒冰教授	冯和法(167)
陈宝箴之死的真相	宗九奇(196)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史略

王昆仑 王炳南 屈武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秘密组成的一个革命的政治工作团体。它于抗战中期——一九四一年夏在重庆成立，积极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南京、北平、西安、重庆和东北等地继续开展活动；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在北平宣告结束，历时八年有余，对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起了相当重要的配合作用。

—

抗日战争中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实现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于一九四一年一月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掀起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政治上、军事上向共产党展开了进攻，企图以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共投降活动，成为当时时局的主要危险。

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通过各种方式，揭露其反共投降阴谋，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同时，鉴于在第一次大革命与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中共党员加以凶暴摧残的惨重教训，为了尽量减少党和进步力量的损失，避免牺牲，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白区党的

工作指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一方面，有计划地把在重庆的一批党内外干部分别送到延安、苏北以及香港、南洋一带，或转入西南内地。另一方面，从斗争需要出发，周恩来提出在重庆要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与党配合工作。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高潮中，党亟需有些党外人士对各方面进行联系，来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同时还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洞察国民党内部的动向。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左派和上层人士中，有些人早在抗战初期即与周恩来在南京、武汉有过接触；到重庆后，又参加着党领导下的一些政治活动。他们拥护党的政策，并团结在党的周围。由这些同志联络其他一些同志，成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的条件是成熟的。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就是适应当时这种形势和革命工作需要，由一部分中共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较高的幕僚职位的革命人士在重庆组成的。

二

一九四一年夏，在周恩来、董必武和王若飞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经王昆仑、许宝驹和王炳南等酝酿，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重庆正式成立。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发起人会，亦即成立会，是在重庆领事巷十号康心之公馆（即屈武同志住所）召开的，参加的共有十八人，他们是：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昆仑	王炳南	邓初民	刘仲容	许宝驹
许宝騄	阳翰笙	闵刚侯	吴茂荪	侯外庐
屈武	阎宝航	高崇民	郭春涛	梁嵩然
赖亚力	曹孟君	谭惕吾		

（邓初民、郭春涛后来退出）

在这次会上，王昆仑、许宝驹被推为主要负责人。王炳南代表中共参加，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关于组织名称，成立时起名为“中国民族大众同盟”，经过一年后改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为“民革”。嗣后，为了与李济深、何香凝等同志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在香港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简称“民革”）相区别，一九四九年六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一般被通称为“小民革”。（参阅附件一、二、三，周恩来同志于一九四九年四、五月两次谈话皆称该同盟为“民革”，六月的讲话中改称为“小民革”。实际上，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政治组织，“小民革”成立在前，“民革”成立于六、七年之后，两者并无大小之分，也没有组织上的有机联系。有不少“小民革”成员参加了“民革”组织，那是因为一方面推动国民党民主派的工作是“小民革”的政治任务之一，另方面也是由于各个人政治历史条件所形成的。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习惯地被简称为“小民革”已成为客观事实，自亦不必更改。特在此加以说明，以免引起人们的误解。）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政治团体，有较严密的组织。同时，它又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既有中共党员参加又有各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的团体，它的成员也有参加其他人民团体的，因此它也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任务，主要是在政治活动方面。在抗日战争期间，它积极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努力促进国内团结，把国民党中愿意进步的人，尽量争取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在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制造分裂、阴谋妥协、反对民主的情况下，它从国民党内部去进行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悍然破坏旧政协协定，公开发动屠杀人民的内战，这时，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从国民党内部进行了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特别是利用它的

成员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置身敌人内部的有利条件，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国民党内政治倾向较好的上层人士，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同时，它还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深入的了解，向党提供国民党内部各方面的情况。此外，它还努力协助国民党民主派的活动，配合中国共产党进行各方面的政治工作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等等。这些，就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主要任务。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立之后，成员逐步发展到近二百人。除了在重庆开展活动外，有的回到北平沦陷区（如许宝骥），有的前往外地（如杜斌丞、屈武去陕西），分别开展工作。

一九四五年春，在重庆举行了一次全体盟员大会，有四十五人出席，会期两天。大会由王昆仑主持，汪季琦担任秘书长。在这次会上，王炳南作政治报告，许宝驹作组织报告，并选出中央委员二十一人，名单及代号如下：

（按姓氏笔划排列）

于振瀛（兴）	王昆仑（冈）	王炳南（彪）
刘仲容（量）	许宝驹（轩）	许宝骥（发）
阳翰笙（墨）	沈志远（近）	吴茂荪（盛）
杨明轩（朗）	闵刚侯（柔）	汪季琦（年）
杜斌丞（相）	屈武（纬）	金仲华（贵）
侯外庐（内）	高崇民（敬）	徐淡庐（恬）
曹孟君（孔）	阎宝航（元）	
赖兴治（隆）	（即赖亚力）	

三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立于国民党反动派大后方统治最严的时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内部各主要机构中进行秘密工作。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通过各种渠道，

做了一些有利于抗战和民主的工作。有些成员利用自己在国民政府内所担任的较高的幕僚职位，经常把了解到的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等情况，及时向党组织反映。如赖亚力在冯玉祥身边工作十多年，刘仲容、刘仲华也长期在桂系李、白身边工作，都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有的利用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在会议场所，揭露蒋介石集团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如王昆仑在一九四五年举行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另外，在推动国民党民主派的工作中也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于八月二十八日亲临重庆，举行重庆谈判。在渝期间，毛泽东曾在重庆红岩村约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主要负责人王昆仑、许宝驹和屈武，并招待晚餐，谈了一个通宵。会见时，周恩来同志和王炳南也在座。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国民党当局假和谈、真备战的真实情况，并提出对时局的看法。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工作表示赞赏，他首先对“小民革”同志们经常提供的情况表示感谢，认为这些材料对延安分析时局动向帮助很大。同时，他对争取国民党内部进步势力的问题十分关心，勉励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同志努力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工作。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还曾利用中苏文化协会这个机构进行一些工作。王昆仑曾以常务理事名义主持会务，随后屈武、刘仲容先后以秘书长名义主持会务。侯外庐担任《中苏文化》杂志主编，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期间曾应邀参加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庆祝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大会，受到陪都文化界以及各方面人士的热烈欢迎。宋庆龄、孙科、冯玉祥、邵力子等数百人出席了大会，盛况空前。

抗战期间，周恩来经常往返延安、重庆之间，每次从延安回到重庆后，总要邀集“小民革”少数同志座谈，传达党中央新的方针、政策和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可以说“小民革”的工作一

直是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一九四五年十月，毛泽东离开重庆，回到延安后，在一次干部会上，曾谈到在重庆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同志会见的情况，提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这些朋友对党的政策了解得透，理解得深。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月于北平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同志两次谈话中，都提到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期间与“小民革”同志的那次会见，认为谈得最相得的是“小民革”的朋友。

一九四六年一月，旧政协在重庆开会期间，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在此期间，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还编辑出版了六期《人民观察家》。它是油印的内部刊物，由王昆仑主要负责，汪季琦等同志担任编辑。该刊物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和主张，发给“小民革”成员阅读，以便统一思想认识。此外，还刊登了一些介绍和解释旧政协议案中有关争论原委的文章。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还组织领导了一个革命青年组织——中国民主实践社（简称“民实”）。这是由一些革命青年参加的秘密组织，主要负责人有曹孟君、蒋燕等，在抗战期间及人民解放战争期间都开展了一些群众性的民主革命活动。

四

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中央领导机构从重庆迁到上海，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斗争活动。当时，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执行其内战政策，向人民解放区发动反革命战争。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把反内战、反独裁，从国民党内部瓦解其反动统治，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在南京，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员中担任立法委员的同志，召开一系列座谈会，提出和平主张，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做了不少的工作。同时，还支持上海、南京等地的人民团体和学生所展开的反饥饿、反内战的斗

争。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还利用自己有利的工作条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有的掩护了共产党员的电台；有的帮助党搜集所能得到的重要情况材料。

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还在一部分文化教育界、知识界人士中继续发展组织。梁希、许宝騄、涂长望、潘菽、薛愚、郑伯奇、俞平伯、董每戡、叶丁易、费青等先后加入了“小民革”，他们在文化、教育、知识界人士中也都做了不少工作。

五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国内战争形势根本转变，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在这期间，蒋介石集团对爱国民主人士加紧进行迫害。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进行工作。在上海的有吴觉农、金仲华、闵刚侯、徐淡庐、孙晓村等；在南京的有于振瀛、谭惕吾、陈建晨等；许宝騄经常往返宁沪两地，负责组织推动工作；许宝騄等离沪赴港后，在上海设立国内工作委员会，由于振瀛、胡绣枫、秦柳方等负责；在北平的有余心清、许宝騄、袁翰青、孙承佩等；在东北的有高崇民、阎宝航以及苏从周等；在重庆的有彭友今、赵景生、王健行、甘祠森等；在成都的有田一平、胡春浦等；在西安的有杜斌丞、杨明轩以及马文彦等；在江西的有汤允夫等。其中北平是当时军调处执行部的驻地之一，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北平的工作在一段时间曾得到叶剑英同志的亲切指导。在上述这些人当中，杜斌丞同志被反动派逮捕，慷慨就义，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壮烈牺牲；余心清因密设电台与延安联系策动孙连仲起义并掩护一批共产党员，在北平被捕，同案被捕的有丁行和梁蔼然同志，丁行惨遭杀害；陶敬之在重庆解放前夕为革命而献身。

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革命工作的需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部分负责人离开了国统区，从事反蒋斗争。许宝騄、曹孟君、金仲

华、侯外庐等前往香港；王昆仑、赖亚力、吴茂荪等先后去美国，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协助冯玉祥将军组织成立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在美国积极开展民主活动。一九四八年六月，吴茂荪从美国到香港，这年冬，他同许宝驹、曹孟君、侯外庐等先后由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王昆仑、赖亚力等也从美国取道苏联到达东北解放区。

一九四八年，全国战局急转直下。这年冬天，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平津战役。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留在北平的成员，和中共地下党以及民主党派保持密切联系，在宣传党的政策、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中都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工作。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被迫“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在此期间，刘仲容奔走于南京、武汉、北平之间，为配合和谈进行秘密活动。在此期间毛主席曾接见刘仲容，了解白崇禧的动向。四月一日，南京政府派出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屈武、刘仲华担任了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和谈达成协议，并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屈武同黄绍竑一起被派飞往南京，由于李宗仁、何应钦南京政府拒绝签字，和谈终告破裂。屈武经上海前往新疆，策动起义，在新疆和平解放中起了积极作用。

六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陆续来到北平。周恩来同志曾先后三次同“小民革”的同志们作了亲切的谈话，给大家很大鼓舞。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同志在六国饭店对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央少数同志的谈话中，充分肯定“小民革”在中国人民革命过程中所起的政治配合作用。他开头说了这样几句话，是十分语重心长的，他说，对小民革的评价，不想着眼于工作成绩的多少。他承认小民革在革命过程中做过一些工作，亦有若干

成绩，但若以工作成绩来估计小民革的价值，便很难说了。某些工作算是小民革做的，也可说是别人做的，没有小民革，那些工作也未必无人做。至于成绩更难确切计算。强调工作成绩一点，亦易引起别人的不服，在与各党派相处的关系上是不相宜的。重视小民革，是着眼于它的政治作用这一点上。他认为“小民革”所起的政治作用是大的，“小民革”的政治见解基本上与党相同，立场极好，而且处处与党的政策及作法密切配合。组织之始即与党协商配合，并且有中共同志参加在内，是为与党配合工作而组织，非先有团体而后拉关系。周恩来同志在这次谈话中对“小民革”的同志期望很大。他除了肯定“小民革”所起的政治作用外，也指出了“小民革”同志在思想方面、政策方面、作风方面所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还指出“小民革”今后的任务及做法。

同年五月二十日下午，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许宝骙家中举行冷餐招待会，约请中共中央领导人参加，到会的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邓颖超等同志。周恩来同志又讲了一次话。他谈到，“小民革”与中共之间可以说彼此相知甚深，在许多斗争行动上，与党一致，在国民党内部起了进步的分化作用。他说从“小民革”成立以来同党的配合工作上讲，确实是发生了成功的作用。周恩来同志谈到“小民革”今后的组织形式时，指出：“小民革”应该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组织，不是政党而是政治活动的团体。他说，“小民革”今后的任务是繁重的，譬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都可参加活动；也可到各政党里去活动；其他如工人、青年、学生、妇女、文艺、科学、华侨、工商界、宗教等民间团体也是一样可以参加的，周恩来同志强调指出，中心任务是学习，而学习是以政治科学为主，要成为各个团体中政治的推动者，与党配合工作。

同年六月十六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在所作《关于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中，又一次公开谈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性质和工作问题，

对“小民革”过去所起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以上所引周恩来同志的三次讲话,请参阅本文附件一、二、三)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周恩来同志有关这个组织的三次讲话的精神,决定结束该盟组织,并授权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阎宝航、金仲华、吴觉农、袁翰青七位同志,代表该盟,发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结束声明》,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散发,正式宣告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结束。声明说:“人民民主革命已经获得基本胜利,国内反动残余力量就要全部肃清,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本盟过去的历史任务既已终结,原有的组织也就当然不必存在”,“本盟中央委员会根据目前形势和盟员的意志,郑重决议,自即日起宣告本盟的结束”。(参阅附件四)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宣告结束后,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中国新政治学会(会长是林伯渠,副会长是陆定一、王昆仑、高崇民、钱端升,秘书长是阎宝航)。

原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中有三十多人,分别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当选代表,出席了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吴茂荪 汪季琦 许宝驹编写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周恩来对中国民主革命 同盟中央同人的谈话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一、对于民革^①的评价

对于民革的评价，我不想着眼于工作成绩的多少。我承认民革在革命过程中做过一些工作，亦有若干成绩，但若以工作及成绩来估计民革的价值，便很难说了。某些工作可算是民革做的，亦可说是别人做的。没有民革，那些工作亦未必就无人做。至于成绩，就更难确切计算。并且，强调工作成绩一点，亦易引起别人的不服，在与各党相处的关系上是不相宜的。我们重视民革，是着眼于它的政治作用这一点上。民革所起的政治作用是大的，民革的政治见解基本上与中共相同，立场极好，而且处处与中共的政策及作法密切配合。民革组织之始即与中共协商配合，并且有中共同志参加在内，可以说，是为与中共配合工作而组织，非先有团体而后拉关系。一九四五年毛主席见到民革许多朋友，感觉这些朋友在思想上、政策上、策略上都容易说得通。这是民革最大的特点，是与别的党派不同的。所以中共对于民革朋友看法，认为现在已经、将来也会走上“非党布尔塞维克”的路，引为“党外同志”，这不仅是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才这样看你们的，乃是自重庆以来，就是这样看的。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别朋友都已是如此，但对整个团体的认识是如此的。我们彼此之间无隐讳、无隔阂。当然亦并不是说，中共与民革便能百分之百地相

^① 这里“民革”是当时对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简称。一九四九年六月新政协第一次筹备会以后，改简称为“小民革”。请参阅“史略”第二段的说明。

处无间，磨擦和距离还可能随时发生的。但这不要紧，因为基本上政治见解是一致的。我们所以珍视民革这一团体者在此。

说到对于民革的批评，虽然我对于民革的中心人士都认识，对于民革的许多工作都清楚，但不想一一予以批评。我只提出原则性的两点批评，朋友们可以参考。

第一点是思想方面的问题。搞通思想，确确实实不是容易的事。我们主观上热烈地要求革命，但欲达到马列主义的科学的思想方法的境地还很远。中共同志亦很多是如此的。像毛主席那样思想方法的圆熟，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曾有过主观主义的倾向，个人主义的倾向，机会主义的错误，“左”倾和右倾的偏差。中共同志有集体的生活，相互的批评，尚且有这样的现象。民革朋友的生活环境与我们不同，工作条件与我们不同，过去又无法接近新的好的读物，思想中的杂质，思想方法上的欠缺，必定是不能免的。民革朋友又多是聪明有才气的人，而正是这样的人往往不能虚心学习，这是很危险和需要警惕的。民革朋友须加强学习。学习的途径有二：一是向群众学习，群众的创造力真是不可想象的伟大，我们要多多接近群众，生活在群众中，一脱离群众必陷于孤陋寡闻。二是求教于好书。马克思、列宁的辩证唯物论，毛主席的著作，确是积多少人的思想经验而总结出来的真理，是值得我们钻研的。

思想方法没有搞通，表现在实际工作上，便是作风有毛病。民革朋友往往争论半天而不能解决问题，便是思想方法有毛病的证明。作风有毛病，对于处理事情，解决问题，便不能熨贴适当。作风上最易犯的毛病有二：一是骄傲；二是急躁。骄则不肯接受别人的意见，躁则不肯等待，往往把事情弄坏，因为中国是经济落后的社会，犯急性病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二者都是危险的毛病。

第二点是政策方面的问题。民革的政治路线与中共一致，毫无问题是正确的。民革朋友在政治工作中密切与中共配合，亦是

很好的，只是在政策的把握上，就原则性与灵活性二者的配合一点而言，民革朋友往往是灵活性强而原则性弱。灵活性强，说得好是善于适应，而毛病则在迁就环境。但民革的大关节是清清楚楚，立场是无可疵议的。民革朋友多从事于政治的策动运用工作，因而不得不提高灵活性，亦是当然的，但一般说来，应当力求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恰当配合。灵活运用总不可超过原则，更不可违背原则。当然如把原则性过度提高到机械主义的程度亦是不对的。老好人不能解决问题，不能领导工作，也还是缺点。如何纠正这种偏差？基本上还是要学习，把思想搞通。

总结起来，民革的立场、原则是好的，但思想方法没有完全搞通；民革的政治路线及政策是对的，但实际执行工作时不无偏差错误。总之，民革成绩多于错误，作用大于缺点。这是我对于民革的总评价。

二、关于民革今后的任务及做法

革命发展到今天，客观的情形与以前完全变了。朋友们不免要问：此后民革还有无任务？还能否起作用？中共还需要否？如果没有任务、作用及需要，这个团体就不必继续存在了。我对于这几点的答复都不是否定的，而全是肯定的：民革此后还有任务，不过任务与前不同了；民革还要起作用，并且作用要更扩大，不是缩小；中共是需要民革配合工作的，并且是长期的永久的合作。

要规定民革的任务，须先确认民革的基本性质。民革这一团体，我认定是革命的知识分子集团，已经走上革命的知识分子的道路。今后，就顺着这条大路走上前去，这是一条光明的大路。知识分子从事革命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还不就是“布尔塞维克”？为什么还要自居于小资产阶级，想代表小资产阶级？自然，若就出身来说，我们大家都是小资产阶级，我个人更是出自没落的封建家庭，但是我们既已从事革命多少年，便应进入无产